

编辑人语

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，每一次灾难都应该被铭记。

逝者安息。我们将带着地震留下的悲伤与温情、争论与反思再度起步。从汶川、玉树看芦山，地震带给我们的记忆成为抗震救灾“国家思路”的一种诠释。

大灾当前，国人不冷漠。我们有热血澎

湃的青年，也有朴实忘我的村民，更有装备齐全的救援队伍。为了救灾，每个人都愿意奉献。可是为什么，在灾区，我们却看到一些人混乱迷茫，各自为营？

一旦提到与部门合作，民间救援组织满脸拒绝，宁可做重复的无用功，宁可信任一个农民担任总指挥，也不主动联络。原因是什么？是信任危机还是相关部门效率低下的印象？其实，救援更应该是一股绳、一把筷，而不是猜忌和排斥。要

摒弃资源浪费实现良好互动，我们更需要一种体制，它能带来无限凝聚力。

每个人都想当英雄，只是如果每个人都是英雄，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作谁来完成？志愿者应及时转换思路和角色。不及时，批判指责之声就会巨量涌现。实际上，志愿者是无辜的，他们盖张报纸就能睡在雨中，扛起几十斤物资就能奔波几十里路，他们是在用生命付出，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，谁又有权利谴责他们？

地震留下很多反思，无序状态和个人英雄心态如何扭转？相关部门是否尽到最大努力？维护志愿者和救援队伍合法权利的法律法规能否及时出台？基层干部如何摆脱压力和民意的双重挤压？

站在破碎的瓦砾上，静望雅安，我们期许，国家、组织和个人能在痛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。因为，当灾区从忙碌的救援，渐渐归于持久的重建，考题才真正开始。

本报记者 王娟

NGO们的“盟主”呼唤

信息不畅、沟通困难，找不到“组织”的NGO该如何自我整合

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

一个农民
成灾区“总瓢把子”

4月21日凌晨3时，三石（化名）和同伴刘林下定决心：就是靠自己两条腿，也要走到震中芦山去。

这时他们正站在从成都到雅安的高速公路上，刚刚，他们搭乘的贵州蓝天救援队的车爆了胎。三石并不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，坐上这辆车，纯属偶然。

他俩都是成都双流县的普通农民，有时出门打工。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时，三石正在家里，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，三石热血沸腾：我要去救灾！

平日里，三石在网上参加了一个“通用航空”群，那天，群里也沸腾了。

同在群内的贵州蓝天救援队首先行动起来，就这样，三石跟贵州蓝天救援队取得了联系，并约好当晚在成都双流机场会合。

然后，三石的传奇经历开始了。4月20日晚上11点，三石和同乡的刘林在双流机场见到全副装备的贵州蓝天救援队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，三石、刘林还来不及欣赏那些高级的专业救援设备，就急匆匆跳上车出发了。

可刚上高速路不久，蓝天救援队的车爆胎了。三石等不及，他决定跟刘林步行边截车到芦山县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三石和刘林来到满目疮痍的芦山县城，此时县城停水停电，手机信号也不稳定，到处是乱哄哄的人群，以及从各地集结来的救援队和志愿者。

芦山县城很小，他们很快又与贵州蓝天救援队会合，当时几乎所有的救援队和民间组织、企业以及政府临时办公点都聚集在芦山县主干道迎宾大道两侧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密密麻麻。

三石穿上了蓝天救援队的队服，还有了一部他们的对讲机。三石说，这是因为贵州蓝天救援队缺药，他找朋友帮忙筹到了钱，给蓝天救援队提供了药品，双方熟了，这才给了他服装和对讲机。

刘林没这“待遇”，他只领到了一件志愿者衣服，在他眼里，三石是个“很擅长跟人打交道的人，在村里就这样”。

4月21日的芦山县，仿佛还没从噩梦中清醒，一片茫然和混乱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全国几百家民间NGO组织加入雅安抗震救灾的队伍，上万名志愿者陆续涌入灾区。

此时，芦山县通往宝兴县的公路还没有打通，县城通往下面一些乡镇的路也在不断塌方，大家对具体灾情一无所知。

不断有NGO组织筹集到救灾物品，源源不断往雅安送来，各种



23日，蓝天救援队在宝兴搜救时发现一居民区有一面危墙，随即将其破拆。本报特派记者 郭建政 摄

四川成都双流县的农民三石（化名）自己也没想到，因为去雅安的道路上搭乘了贵州蓝天救援队的车，而成了包括地方红十字会、救援队、基金会、志愿者协会在内多家NGO组织的“总协调人”，宛如真实版的《让子弹飞》。

当时，几百家NGO组织一下子涌入灾区，彼此之间缺少协调各自为营，与政府机构之间又存在的艰难沟通，这很像两条平行线，其实他们很想交织到一起，拧成一股绳，可又总是不能相交。

4月20日之后的雅安，正在进行一场赛跑，所有人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进，却又队形混乱。

牌子的矿泉水、方便面、棉被等物资像小山一样堆积在迎宾大道上，宛如一场救灾物品博览会，可下面的乡镇却是缺吃少穿，急需支援。

堆积如山的物资该往哪里送，怎么送，这成了大问题。

三石“擅长跟人打交道”的性格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开始发挥作用，他从去探路的志愿者那里，得

知哪个村子最缺什么物品，以及路况如何，然后提供给带来物资却不知道往哪里送的NGO组织。在从芦山县城到双石镇的路刚刚抢通时，他帮着一家企业家协会送物品，顺便跟他们混熟了，后来他又帮忙送一家地方红十字会的队员到达驻地，跟红十字会又搭上了关系。

就这样，三石把贵州蓝天救援队、广东红十字会中山救援队、北京828志愿者协会等NGO组织联合起来，甚至连宗教界的慈爱基金也加入进来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按照三石的协调运送到需要的地方。

三石的“救援规模”越做越大，三天时间，他就组织起一个骨干20多人的小分队，分成物资队、运输1队、运输2队、搜救队。

其中，搜救队只招募退伍特种兵志愿者，组成突击队，到“公路2公里以外”的偏远地区，摸排当地的物资发放情况，并及时反馈到物资队，然后三石再去这些NGO组织协调粮食、水等物资，由运输队送到村里。

越来越多的NGO组织加入与三石的联动，甚至，三石还在龙门乡、草坪村开设“分部”，专门接收从他这里送去的物资。

只是除了刘林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他们的“总瓢把子”只是一个意外搭上了蓝天救援队的车的农民志愿者。

灾区NGO
紧急自我整合

没有人想去追究三石到底是不是救援队的正式队员，他的真实身份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三石提供的，正是他们想要的，这就足够了。

在灾区，山头林立，各自为

营、信息不畅、沟通困难，自身能力资源有限，却又找不到“组织”的NGO组织，正迫切需要“张麻子”的出现。

也有NGO组织选择了进行紧急自我整合。

地震当天，通过微信搭建起的“成都公益圈”救援平台诞生，14家民间公益组织抱团组成“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”，三天之后，“成都公益圈”扩展到5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，并迅速发挥“统领”作用。

“成都公益圈”下设对外联络部、物资管理部、灾情信息收集部等12个部门，每个部门都确定了专门负责人，并在群内公布联络方式，各公益组织定期召开开商会会议，共享信息，分工协作。

“平台协调民间救援力量，避免了无序救灾。”“成都公益圈”对外联络部负责人、成都市科技新闻学会的张鸣说。

其实，在汶川大地震时，就曾有一些民间组织试图抱团，但最终不了了之。

也有民间NGO组织从汶川大地震的教训中痛定思痛，开始尝试NGO联合的模式。比如这次将指挥部设在雅安的“联合救灾”，就是在一个多月前成立的一家常态化的救灾联合体，目前已吸纳了11个省的200多家NGO联盟为其成员。

但事情总有不完美。

在出发前，“联合救灾”常委会作出决议，“联合救灾”代表200家成员组织前往灾区，各组织就不要再自行派人进入灾区，因为“如果每家派10个人去，那灾区就多了2000人”。

进入灾区不久，“联合救灾”成员之一、NGO各灾中心秘书长张国远发现，一些成员组织又打着自己的旗号进入灾区，有的成员组织干

脆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“联合救灾”指挥部旁边，还有的组织把筹集来的物资自己先消化掉。

“NGO是一个开放的、多元化的、包容的组织，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，就是价值观也是多元的，所以把各个NGO统一在一起是不可能实现的。”张国远表示。

民间和民政部门
如何良好互动

4月24日，一家NGO组织给芦山县龙门乡五星村送去一批帐篷，没有通知村委，直接分发给村民。

没有分到帐篷的村民急了，他们分不清帐篷是民间救援还是政府发放的，在他们眼里，这是不公平的：走，找村主任去！

又一批民间筹集的矿泉水和方便面送到了，还是直接发给村民，没分到水和方便面的村民又急了：找村主任去！

村主任就被村民包围了。这时候，又有志愿者带着外界捐助的帐篷来了，两顶大帐篷，一个能睡40个人。志愿者一进村，就看见村民围着村主任喊“不公平”，志愿者一看，这个村有问题，赶紧把帐篷再拉回去，村主任一路小跑追出来。

不愿与政府打交道，这是进入灾区的一些民间组织的“通病”。

三石的联合队成员告诉本报记者：“我们不与政府部门打交道。”

“中国扶贫基金会、壹基金这些大的基金会和民间组织，来到雅安后都会第一时间跟政府通气，商量如何联手救灾，政府会给他们统一分配，划定区域，”北京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副主任刘宝宗说，“但一些草根NGO都是自己干自己的，不愿与相关部门沟通。”

“我们4月20日下午到达后，第一时间先跟政府接触，”张国远告诉本报记者，“但感觉未受到重视。”

芦山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，一些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没有及时与他们沟通，而是自己发放救灾物品，造成了一些地方物资的重复发放。

两者就像是两条平行线，很想拧成一股绳，却总是不能相交。

三石的特种兵搜救组继续往公路通不到的深山跑，他们将那些村子的实际情况第一时间通知后方物资队，后方的三石就联系NGO送水送粮。此时，政府的救援物资通常还没到。

相比政府相对复杂的发放程序，NGO既快速又灵活。刘林说，“但我们只能救急，救不了长久，重建还要靠政府。”